

冯尔康
著

尝新集

康雍乾三帝

与天主教在中国

CHANGXINJIKANGYONGQIANSANDI
YUTIANZHUIJIAOZAIZHONGGUO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冯尔康 著

尝新集

康雍乾三帝

与天主教在中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 / 冯尔康著
--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6
(名家讲堂)
ISBN 978-7-5528-0535-2

I. ①尝… II. ①冯… III. ①罗马公教—基督教史—
中国—清代 IV. ①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8351号

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

冯尔康/著

出版人/张玮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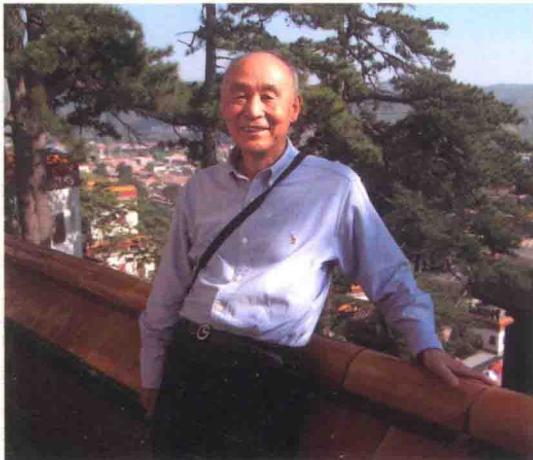
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 字数 277 千字 插页 8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8-0535-2 定价：60.00 元



冯尔康，1934年出生于江苏仪征，南开大学暨历史学院荣誉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创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历史和史料学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著述有：《雍正传》《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清代人物三十题》《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顾真斋文丛》《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概论》《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生活在清朝的人们》《曹雪芹与〈红楼梦〉》等；主编并主撰《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主编《清代宗族史料选辑》，合著《中国宗族史》等。



十二位盘式手摇计算机



木盒套装15件绘图仪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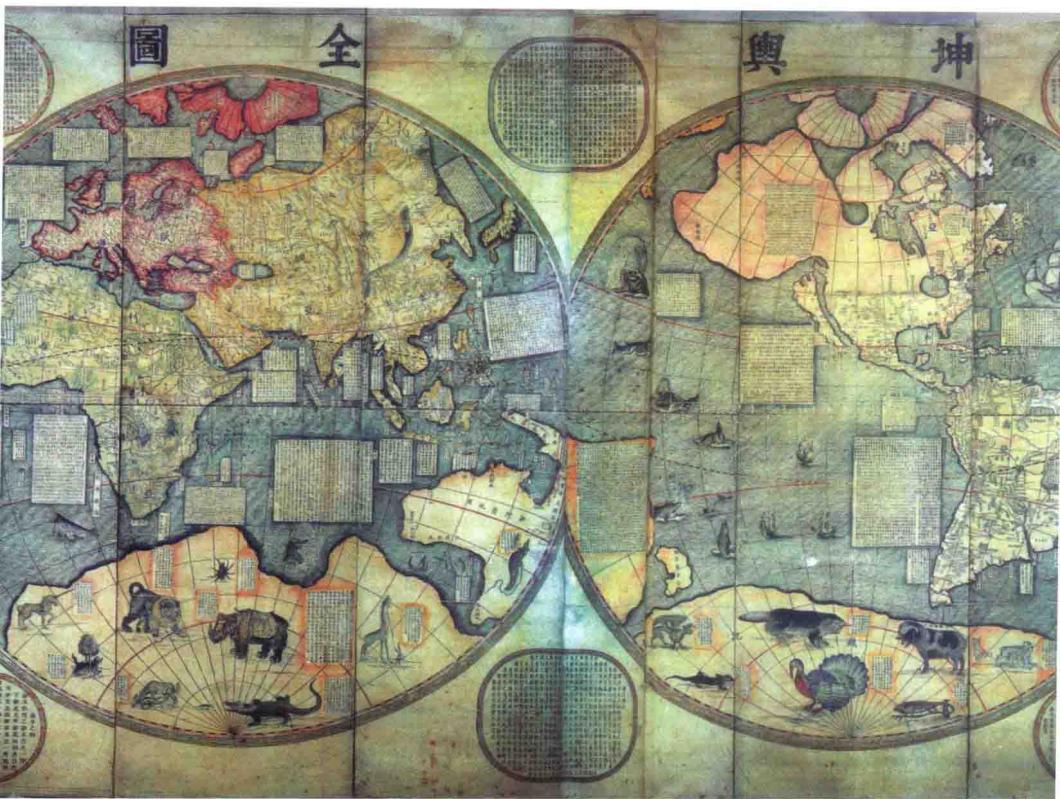


《康熙帝读书像》轴

Le Pere Ferdinand Verbiest.



南怀仁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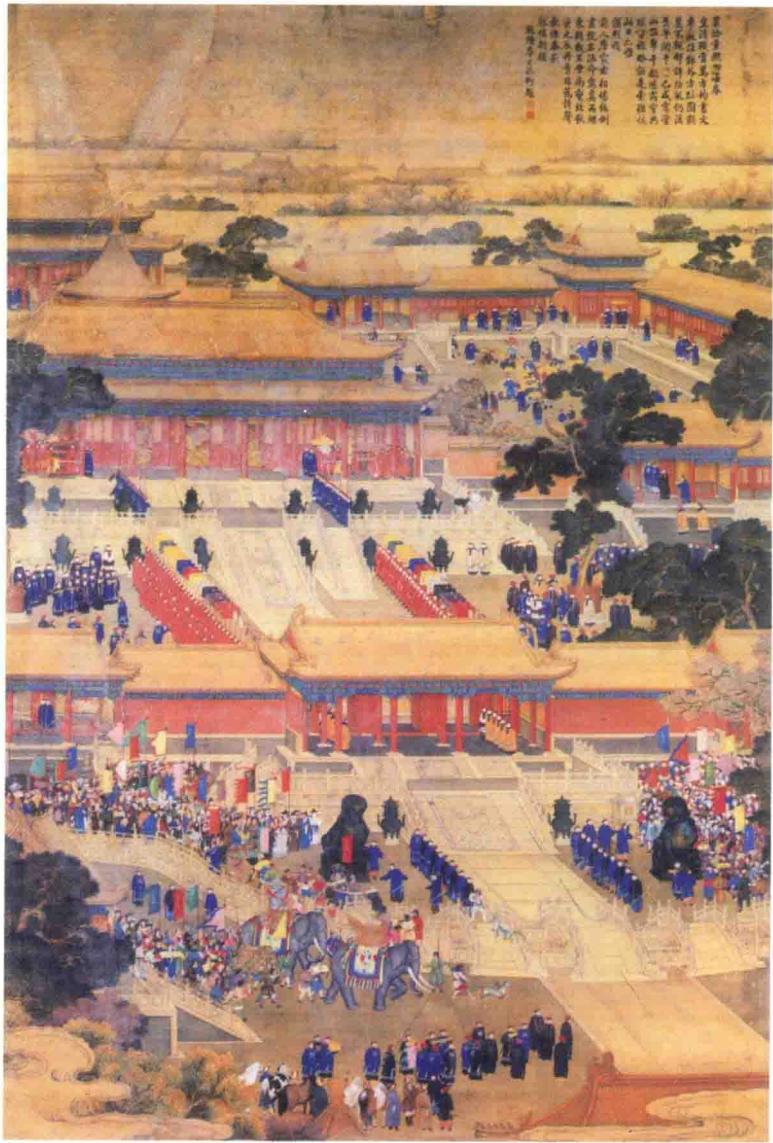
南怀仁《坤舆全图》



《皇清职贡图卷·法兰西人》



《皇清职贡图卷·鄂罗斯人》



《万国来朝图》轴



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内景



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又称北堂）



法国皇家军队用瓷壶（康熙年间制）



珐琅彩黄地开光洋人山水绶带葫芦瓶（乾隆年间制）

（以上图片引自：故宫博物院编、朱诚如主编《清史图典》，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版）

自序

我想借用写作自序的机会，述说从事清代前期天主教史探讨的原因、研习心得，以及今后的愿望。

我的有关清代前期天主教在华传播与朝政关系史的文字陆续披露后，有友人好奇地询问：你怎么做起这类文章？我明白这么问有两种含意：一是你平常不做这种题目，为何突然有了兴趣？二是你不懂外文，能做下去吗？是啊，问得好，我也不时地这样追问自己，尤其是后一问题。好吧，就来清理一下此种研治的缘起吧。

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中法文化交流大展”，并于2011年11月中旬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举行“十七、十八世纪(1662—1722)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我出席了会议。会前应台北《故宫文物月刊》之约，写出《康熙帝与路易十四帝王的共性》(刊登在该刊2011年12月号)。会上为友人陈捷先教授《康熙帝与中西文化交流》一文做引言人，预备了讲稿。会间参观“大展”，首次见到康熙帝模仿、创新制造与使用的数学仪器，有圆规、角尺、平分线比例尺、十二位盘式手摇计算机、几何体比例规、数学用表、八位对数表、刻有比例表的炕桌等等。事前，我从文献中知道康熙帝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一些情形，看文献上的东西，平平淡淡，而这次参观中欣赏到的实物，不少是从来未闻未

睹的物件，令我大为震撼。三百年前康熙帝就使用上了计算机、八位对数表(如今中学生使用四位对数表)，那些物件中有宫廷仿制的，可见康熙帝在数学仪器使用上并不落伍！同时真切感受到康熙帝强烈的求知欲望，多少有着尊重科学新知识的意识，因而屈尊以西洋传教士为师，并模仿制造西方仪器，须知这是在中华帝国是世界文明中心论时代的帝王举措，因而令我叹服他的不寻常品格！震惊之余，刺激着我去了解“康熙帝与西方文化”的历史，而康熙帝的西方知识是从传教士那里获得的，研习康熙帝与西方文化的课题，离不开探讨他同传教士的关系，离不开探讨传教士的东来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也就自然涉及清代前期天主教史。就这样由康熙帝与西学的关系，引起了我对清代前期天主教史的研究兴趣。

这时，我想到我和友人王思治教授合作编著、2006年出版的《康熙事典》，在我写的部分(第378页)错误地认为罗马教廷传信部的马国贤为耶稣会士，思及于此，甚为赧颜。我在该书《后记》中写道：“本书类似于工具书，史实应当绝对准确。”而我则有这类的教会史方面的错误，心情非常沉重。我是以实证史学观念治史的人，竟然出明显事实的差错！对康熙帝尊重科学技术的钦佩之情与惭愧误失的失落心情两相结合，遂有研治康熙帝与西学、康熙帝与传教士关系史的冲动。从台北返回天津，迅即将《“康熙帝与西洋文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定稿(《历史教学》于2012年第8期刊出)。

史学研究离不开史料，要研治天主教史，掌握原始资料的问题立刻出现在面前。撰写《康熙帝与路易十四帝王的共性》，阅读的是白晋著《康熙帝传》(马绪祥译)、彼得·伯克著《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陈文海撰《法国史》、陈衡哲著《西洋史》等书，基本上是第二、第

三手资料，更没能用西文原典素材。因不通外文而不能运用第一手史料，自然不可能写出高品质的成品。这个问题困扰着我。继而一想，有关天主教的档案及其他史料著作，近年出版了一些，不正是可以利用的第一手材料吗？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集。西文史料中译本不断问世，如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郑德弟、朱静、耿昇等译）、莱布尼茨著《中国近事》（梅谦立等译）、马国贤著《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荣振华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译）等等。我对清代前期历史较为熟悉，把握与利用这些史料相对困难较少。再者，国内外前贤时彦有关清前期天主教史的研究成就虽然丰硕，但是历史复杂，有待研讨的空间尚多，可以有所作为。如此一想，个人研治康熙帝与中西文化关系、清前期天主教史还是有些条件的。恰在这时，时任天津古籍出版社社长、总编刘文君学友来看望，谈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研讨会和展览的事，我说了“大展”中那些康熙帝使用的数学仪器，讲了感受，她甚感兴趣，建议写书，出版社给梓刻。有了这个机缘，强化了我的写作决心。

自 2011 年算起，五六年下来了，有关清朝前期天主教史的文章也写了十多篇，记录了我的研习心得。天主教是外来宗教，传教士的传教与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和艺术的活动展现出西方宗教文化与近代初期资本主义文明，一定程度上（当然是微弱的）影响到中国社会，并产生了中国教徒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对此，我着眼于清朝政治与天主教及其教徒的双向关系，既要明了天主教发展变化史，又要从教

会史角度观察清朝的政治,这就是我的研讨方法。具体地说,心得有五点:

(一)中庸政策有利于社会发展与稳定。康熙帝对天主教教义有所认同,欣赏西方科学技术与艺术,一度允许天主教在各省传教和百姓自由信教。而且对反对天主教的社会势力不加限制,如在宽容教令制定过程中,为避免汉人大臣的阻扰,不令他们参与,也不非难他们,只令满人大臣与议;对儒家道德伦理的主流意识不作任何变动。当康熙帝允许传教士自由传教时,浙江省从巡抚张鹏翮到临安县令,敢于禁教,查封教堂,传讯康熙帝数次接见的传教士殷铎泽,与宽容教令“对着干”,但康熙帝并没有惩治张鹏翮,也没有影响后者的仕途(后来张鹏翮升任大学士)。总之,就臣民对待天主教的态度这一事务而言,康熙帝采取的是中庸施政方针。因此,当天主教与“儒教”产生意识形态冲突时,并没有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试想,造成社会大动荡的变革,往往有后遗症,社会成本很高,代价很大,承平时期尤宜注意于此;大变革时代,如果再批判“过犹不及”论,即使成功了,也将导致社会大创伤。在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上,臣民能够与皇帝政策见解不一,是因为君统与道统分离,君主难以全面控制臣民的思想意识。历史证明,君统、道统的分离对社会有好处,是古人的政治智慧。

(二)应有承认外国文化、外国先进文明的正确态度。中国的悠久历史,中国文明从未间断的事实,令中国人形成深根蒂固的世界中心论,蔑视外国文明,但是中心论的实质是帝王中心论、统治者中心论,是统治者需要的观念。在这种情形下,康熙帝承认西方文化,主动招募西方科学技术与艺术人才,其博大襟怀,真正是前无古人(帝王之中)。但是,他又是“中体西用”论的重要倡导者,不懂得世界文明中的

“普世价值”成分，固执地认为“道”不变，这就限制了他的政治眼光，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三)新兴民族满族的进取精神及其局限性。对于天主教这种外来宗教，顺治帝、康熙帝均持开明态度，满族是新兴民族，接受外来意识形态阻力较小，顺治帝、康熙帝的作为表现出新兴民族的进取精神。同时我们注意到，他们对汉文化的接受更多地体现在制度方面，也即主要方面，反映汉文化影响的巨大。

(四)统治者应如何对待“异端”观念。雍乾禁教中教徒坚持信仰，从事隐蔽的或半公开的宗教活动，甚至为求得对教义的真切理解，往数千里之外的澳门招请西洋传教士；面对政府的高压政策，一些教徒不怕抄家、流放，宁死不退教，不放弃信仰。信仰是发自内心的，是坚不可摧的，禁止无济于事，清朝统治者始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是时或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方针，不那么追究，就有明智的味道了。

(五)运用清朝档案史料和中西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基础性、知识性的专题研讨。鉴于我不具备系统考察清代前期天主教史的条件，遂进行一些具体史事的研治，即康雍乾三帝，尤其是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变化及其原因；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的表现及原因；在雍乾厉行禁教政策下中国天主教徒的宗教情结；清代前期江南教徒的宗教生活；乾隆四十九年陕西教徒招引传教士大案；清代前期安徽天主教史初探。

研讨中脑际不断冒出一些题目，准备次第考究，这些问题：“顺治帝与天主教关系的点点滴滴”“清代前期‘中铎’点滴谈——国人接受天主教本土化研究之一”“清代前期华人天主教仪式——国人接受天主教本土化研究之二”“满人信仰天主教刍议——国人接受天主教